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

祁占勇,鄂晓倩

[摘　要]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与技能强国的基础工程。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职业教育与培训以人才培养为依托连通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成为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底座,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促进职业教育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其中职业教育的效能认同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最关键的因素。澳大利亚通过出台职业教育政策、创新发展计划和实施特色项目,充分展现了职业教育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前提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要保障、以推动个人发展为根本因素的巨大效能,在有效缓解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危机方面提供了"澳洲方案",为我国解决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危机供应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效能认同;实施路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比较视野下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AJA220023,主持人:祁占勇)

[作者简介] 祁占勇,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教授;鄂晓倩,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3)0036-0085-11

职业教育与培训以人才培养为依托连通全球教育系统与经济系统,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底座,全球各国都在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路径。但调研显示,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面临过程度不一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低下问题,这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1]。从国际比较视野来看,全球各国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的方式主要是"以特色取胜""以质量取胜"[2]。其中,澳大利亚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其职业教育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澳大利亚吸引了大量技术移民并汲取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经验,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结合自身的国家特色创新推出一系列适合本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六个州和两个地区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的目标制定、参与主体扩展、课程观更新等方面的重要举措,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既关注职业教育的社会工具价值,又重视职业教育对人可持续发展的本体价值。职业教育对国家、社会及个人的价值、效力与功能深刻影响着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最大限度促进职业教育发挥最优价值,以期提升职业教育的效能认同。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理论框架

从管理学视角来看,效能是效率、效果和效益的综合反映,是达成目标的程度。企业的效能所反映的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的现实性和潜在性,它不仅体现效果和利益的高低,而且还反映取得效果和利益的能力强弱。同理,职业教育的效能是指职业教育所能为国家、社会及个人带来的价值、功能及效用,同时也包括职业教育为国家、社会及个人所能带来这些效用的程度和能力,具体体现在职业教育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个人发展等方面的效用成果

和效用能力中。效能是达成目标的程度，而效能认同即是对这类达成目标程度的一种认可和满意的态度。相应的，职业教育效能认同可理解为社会各方主体对职业教育在社会中功能和效用的理解态度，包括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存在与价值创造的认同，同时在舆论评价、行为导向和教育选择等方面保持心理认可和理性接受[3]。

基于此，职业教育效能认同即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以及个人层面中各方主体对职业教育所产生的价值效用保持比较满意和认可的认识态度与评价方式，或指社会各方主体对职业教育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功能供给和效用能力上产生正向积极的社会共识或价值判断。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出发点，综合考虑国家产业发展需求进行布局，从学徒制引入、机械和艺术学院的建立到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的完善、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s，TP）的开发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断促进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快速发展，为个人就业增加其竞争力，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工作标准，为社会生产提供先进技术与技能人才。从教育系统出发助力经济系统发展，充分展现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个人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效用成果是澳大利亚社会对其职业教育产生高认可度、高信赖值的重要依据，也为我国解决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危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职业教育的效能发挥，将职业教育在经济层面的效率认同和人文层面的效益认同进行有机整合，以构筑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避免职业教育陷入“低质量—低期望—低认同”的恶性循环中。

二、生产效率：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前提条件

职业教育系统以先进技术的转化应用、技术操作人员的培训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为特色，成为提升国家生产效率的动力引擎。效率认同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重要方面，效率认同方面的前提条件和核心指标分别是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能认同，包括学校层面的教育生产效率认同、社会层面的劳动生产效率认同与国家层面的政策生产效率认同，这些因素构成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关键要素。

（一）对学校层面教育生产效率的认同

学校层面的教育生产效率是国家生产效率的重要组成，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实现高效能认同的基石。它不仅体现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全民参与率和满意度上，也体现在职业学校教育和校外职业培训机构的规模、质量及学生就业情况等方面。专门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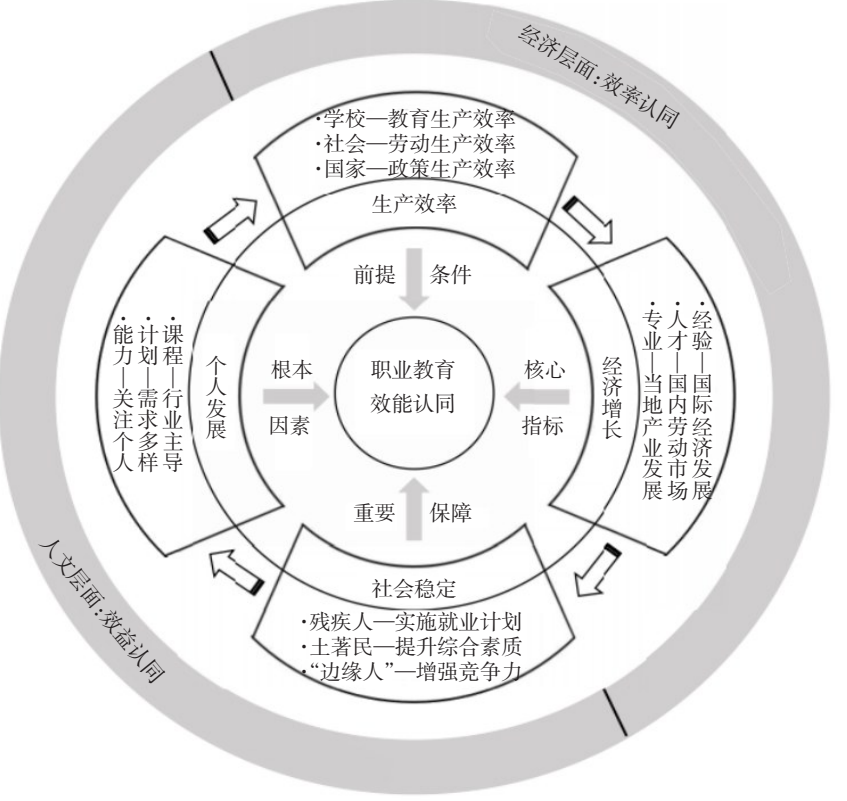

图1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逻辑框架

与培训部门提供信息的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NCVER）发布了一系列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数据报告，这些数据显示目前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社会认同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观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全民参与率和满意度、职业学校办学规模、在学人数和职教课程数量等，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自身的教育生产效率呈现持续提升的趋势。《2021年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VET in Schools 2021）数据报告显示，澳大利亚2017—2021年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增加了3.8%，2021年共有251 200名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的学生[4]；《2021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和课程总数》（Total VET students and courses 2021）的报告显示，有430万学生参加国家认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有3 529家注册培训机构（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RTOs）提供国家认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有210万学生（49.9%）参加了国家认可的项目，包括培训包资格、认证资格、培训包技能集、认证课程等[5]。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涉及领域与提供层次非常广泛，课程和活动提供者也十分多元，相应的，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员数量和层次也更加丰富，满足了全民终身学习、继续教育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全民参与率相对较高（表1），且88.9%的资格完成者对培训表示总体满意，92.1%的短期课程培训者表示满意，他们通过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获得自身想要的技能，实现了技术学习、技能获得和工作能力提升，学习者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结果的整体满意度也相对较高[6]。

（二）对社会层面劳动生产效率的认同

对职业教育生产效率的认同，从职业教育活动的过程来讲，是对职业教育自身的教育生产效率的认同，它满足了学习者及其家长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要；从职业教育活动的结果来讲，是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升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认同，它满足了用人单位的需求。澳大利亚企业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所培养的人才需求量大，且对他们的培训结果持满意态度。2021年10月28日，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关于《雇主对职业教育系统的使用和看法》（Employers' use and views of the VET system 2021）。报告显示，56.6%的雇主使用职业教育系统来满足他们的培训需求，其中27.4%的雇主有学徒和培训生，27.1%的雇主为员工安排国家认可的培训[7]；74.3%的雇主对员工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结果感到满意，74.2%的雇主对学徒和受训者从培训中获得所需技能感到满意，78.7%的雇主对国家认可的培训为员工提供工作所需技能感到满意。当学习者从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中获取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生产有着高度匹配性时，企业雇主往往对其有较高的满意度，进而能有效实现促进社会生产的目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将劳动对象、劳动者以及劳动技术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对社会生产效率的贡献程度。

（三）对国家层面政策生产效率的认同

各国职业教育整体发展均以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为前提，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来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是最普遍的举措之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历经了各

表1　2021年澳大利亚各州或地区15~64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生的参与率（%）

年龄	新南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	昆士兰州	南澳大利亚州	西澳大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澳大利亚
15~19岁	37.3	45.5	53.5	35.4	43.7	35.9	32.9	39.5	44.6
20~24岁	31.7	29.7	37.5	35.0	35.1	39.0	34.7	32.0	34.9
25~44岁	21.0	19.1	27.8	25.6	23.7	29.2	28.3	20.3	24.1
45~64岁	14.4	13.1	19.3	15.5	13.9	17.3	19.6	12.0	16.2
15~64岁	21.0	20.2	28.0	23.4	22.8	25.7	26.4	20.3	24.0

资料来源：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澳大利亚统计局（ABS）。

州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独立发展、联邦政府干预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以及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四个重要阶段[8]，每个阶段国家根据不同阶段特点制定了相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因此，从政策颁布到政策实施再到政策修订，社会大众在政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国家层面的政策生产效率有了更高的认同感。1974年4月，技术与继续教育咨询委员会（Australian Committee on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ACOTAFE）出台《澳大利亚的技术和继续教育：关于技术和继续教育需求的报告》（TAFE in Australia: report on needs in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又称《坎甘报告》，Kangan report），为联邦资助技术和继续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一个公认的课后职业教育体系，创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提供者，提出成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并为后期的逐渐完善奠定了基础[9]；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出于对量的追求，连续出台《迈向技能型澳大利亚》（Towards a skilled Australia）、《通向未来的桥梁》（A Bridge to the Future）、《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 our Future）等国家战略，这些事关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战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加强了教育部门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创建适应学习者与就业者终身技能培训需求在内的职教系统，实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变革转型[10]。2005年，技能型人才危机促成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对质的要求，相继出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新方向》（Skilling Australia: new direc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澳大利亚未来劳动力：国家劳动力开发战略》（Australian workforce futures: a national workforce development strategy）、《共同的责任——面向21世纪的学徒制》（A shared responsibility: apprenticeships for the 21st century）等。近期，在未来经济增长需求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量与质并重，出台《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2021—2030年）》（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该政策旨在从国家层面满足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提升学习者体验、增强全球竞争力[11]。提升澳大利亚政策生产效率也离不开相关部门协同，它们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方面权责分明，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管理机构——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国家TAFE研究中心，就业、教育和培训部，就业和培训顾问委员会，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教育计划与开发部，训练服务部，招生与学生服务部，人力资源部，学习通道与机会平等处，教育服务处，资金与设备计划处，财务部以及院一级的董事会等。

三、经济增长：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核心指标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其所育人才、创新的技术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时刻影响着职业教育中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及规模结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所提供的知识和技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社会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专业技术能力与综合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职业教育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效能的认识是职业教育效能认同在效率层面最核心的判断指标，认同职业教育能促进经济增长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得到社会认同的重中之重。

（一）专业建设支撑当地产业发展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以行业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提供灵活且迅速响应劳动力市场的教育与培训，力图实现“专业结构对接地方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对接企业岗位需求”“课程标准对接职业标准”的“三对接”目标，将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有机联结，实现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最大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共同服务社会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统筹全国各州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联邦政府权威公布人才需求预

测报告、地方政府发布战略规划和经济产业规划等，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建设方向，有效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的功能。澳大利亚政府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中的就业行业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统计更新预测新的就业趋势，发布概述各行业、职业、州和地区未来可能就业趋势的预测报告——《截至2026年11月的就业展望报告》，这份报告为未来五年就业市场的可能发展方向提供急需的指导，指出91.7%的新工作可能需要接受毕业后的职业继续教育，预计就业增长总量的3/5以上将发生在高技能水平工作中，并预测未来五年内四个增长量最大的行业为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科学技术服务行业、教育与培训行业、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12]。

此外，根据相关预测报告澳大利亚政府又对国家技能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2022年技能优先发展事项列表报告》在调查国内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中发现，在需要较高资格和经验的专业职业以及技术员和工匠中的技能三级的职业中存在严重的职业短缺现象，即一般需要三级或四级证书的职业短缺较为严重[13]。基于这些预测报告和调查报告，澳大利亚开展相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并加大对职业短缺的资格证书培训和认证。据《2021年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报告显示，到2021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管理和商业领域是最受欢迎的教育领域，占所有资格证书入学人数的21.7%，其次是社会与文化（19.7%）和工程及相关技术（16.0%）。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在资格证书注册中人数最多的是三级证书（39.4%），其次是四级证书（20.0%）和二级证书（18.8%）。通过这些报告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以灵活多变、迅速反应的课程和培训正不断加大关于职业资格三级、四级证书的培训力度，以填补经济市场的职业空缺。获得这些高级资格证书的劳动者将经过一定周期流入劳动市场来弥补市场职业短缺，提高技能短缺填补比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市场指导职业教育发展，促成职业教育反哺经济市场的良性循环。

（二）人才数量充实国内劳动市场

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为社会经济增长带来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其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学习者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在就业市场的能力和竞争力，扩大就业机会，推进劳动力市场发展，进而提高生产率并激发创新力推动经济增长。在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教育与培训不仅是劳动力获取关键技能的重要来源，还是劳动市场中劳动者的有效供给方，其培养的大量人才不断充实国内劳动市场，支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2023年3月，澳大利亚就业与技能局（Jobs and Skills Australia，JSA）提交的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看法和现状调查材料显示，澳大利亚约36%的就业增长发生在以大学毕业生为主要来源的职业中，而高于60%的就业增长则发生在以获取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人员为主要来源的职业中[14]。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完成率稳步增长，持有至少一个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格证书的现象在劳动力中变得更加普遍，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并获得资格证书的学习者流向劳动市场中的技术人员和行业工人的就业率为64%，流向社区和个人服务人员的就业率为46%，多数行业中超过一半的劳动者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在劳动力极为短缺的护理、数字和数据等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途径或跨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的双重途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澳大利亚政府为吸引更多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者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创建了专门的信息服务网站“My Future”，该网站会及时发布各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信息，向广大求职者展示接受职业教育的整个过程，包括学习时间、所能获得的资格证书等。它将“了解自己”“探索机会”“行业信息”“工作资源”等重要信息聚集到一个平台，并与各大职业院校网站互联，为学习者、求职者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实现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

（三）经验成果促进国际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效能认同不仅体现在

其职业教育专业高度匹配当地产业上，也体现在职业教育为国内劳动市场提供的劳动者数量上，更体现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输出和对国际的经济贡献上。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而积极开展对外职业教育援助，为援助国家和地区减贫、解决青年失业以及技能短缺问题提供了有效可行的经验借鉴。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受援国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改善其生活状况，进而促进受援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也提升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国际认同。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于2014年制定《澳大利亚援助：促进繁荣、减少贫困和增强稳定》（Australian aid:promoting prosperity,reducing poverty, enhancing stability）[15]；2015年发布《2015—2020年澳大利亚教育援助投资战略》（Strategy for Australia´s Aid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2015—2020），通过制定援助政策和战略积极开展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参与受援国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人力资源开发，参与受援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和咨询，协助受援国优化就业环境、加强受援国公民赴澳学习，通过一系列措施大量输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受援国解决技能短缺问题，促进其经济增长与繁荣[16]。同时，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和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进而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17]。

四、社会稳定：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重要保障

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与政府期待、人民满意、社会认可有着密切的联系，职业教育的效能认同离不开对政府工作的促进、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对个人的帮助。效能认同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效率认同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人文层面的效益认同方面，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得更多的人能充分就业、积极创业、实现乐业，进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尤其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实现社会特殊人群（残疾者、土著民、“边缘人”等）稳就业、促创业的目标，助推全社会稳定发展。这为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效能产生高度认同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残疾者通过职业教育完成残疾就业计划

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中残疾人群是拥有较大数量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重要劳动力来源。澳大利亚过去十年的政策变化旨在解决残疾人福利不可持续增长和残疾人就业能力康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自2010年起便提出残疾者就业计划，包括向残疾者开放就业服务和职业康复。开放就业服务主要提供密集和持续的就业支持，如就业信息分享、就业岗位安置、就业能力咨询等支持工作，使残疾人群能获得和保持有竞争力的工作；职业康复服务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职业康复能力，包括职业咨询、个人辅导、专业实践、案例管理、残疾人工作场所的案例管理能力及工作场所干预和项目管理能力[18]。

此外，政府提供了若干额外计划，以支持职业康复成果，其中包括工资补贴计划、就业援助基金计划等。在职业教育助力残疾人职业康复发展课程提供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为残疾人员实施了电子学习计划，目前已有六套电子学习计划可用。该计划不仅重点关注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工作的员工对残疾学生权利、学生需求及注册培训机构责任的认识，而且大力支持残疾学生参与和完成职业教育和培训学习。这两类课程均可在线免费学习并获得相关证书[19]。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帮助残疾者实现充分就业的计划中还创新提出TAFE专家就业伙伴关系模式（TAFE Specialist Employment Partnership，TSEP），即在TAFE学院引入一名合格的顾问直接帮助残疾毕业生，包括帮助他们编写简历、指导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协助选择标准和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等。顾问将与学院教学人员合作，与雇主接触、与高峰机构和专家就业组织沟通，为其所在的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中的残疾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20]。

（二）土著民公平接受职业教育提升综合素质

土著民作为澳大利亚最早的原住民，他们

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已形成独特的文化资源、地域惯习和行为规范。如今，澳大利亚土著民因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走向不断融合发展的道路，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了《土著人就业战略》（Commonwealth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Employment Strategy），该战略为增加土著员工发展机会，确保土著民和其他群体享有同等的职业晋升权利而对雇主提出众多要求，旨在建立尊重、多元和包容的工作环境[21]。在促进土著民就业稳定、生活和谐的反贫困斗争中，澳大利亚政府也积极探索出更具实效性的需求驱动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中心模式（Vocational Training & Employment Centre model，VTEC）。该模式在反土著人贫困的实践中以满足土著民和雇主的需求为出发点，立足于提供精准对接从业岗位的职业培训，以促进土著民可持续就业，职业教育与培训会根据土著民个体的差异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从而确保他们真正受益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达到提高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目标。

目前，澳大利亚共有30个VTEC提供商（包括土著就业项目联盟成员、雇主、注册培训机构）。它们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州，在支持土著民可持续就业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22]。此外，澳大利亚政府也通过开办土著专门职业学校、采用远程教学形式、加强职业教育与土著社区的联系等方式来确保土著民能公平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如“社区发展就业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 Employment Projects，CDEP）、“偏远工作和社区项目”（Remote Jobs and Community Program，RJCP）等，与土著社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为土著学生提供长期稳定的就业服务，确保他们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和掌握工作技能，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23]。

（三）“边缘人”普及职业教育增强就业竞争力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澳大利亚地理位置和教育成果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澳大利亚统计局（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测量到达主要提供服务区所需的路途距离，并根据各地距离确定了五个地区水平，包括主要城市、内部区域、外部区域、偏远和非常偏远地区。本文将“边缘人”定义为在区域、农村及偏远地区（Regional，Rural and Remote，RRR）生活工作的人和相对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Low-SES（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居民。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提高“边缘人”技能水平、综合素质，进而增加其就业竞争力产生了巨大作用。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他们获得以往不曾拥有的技术和能力，并将这些教育成果转换为经济成果，提高就业能力、提升生活质量。2023年1月，《澳大利亚区域、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报告显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产业推动的，与主要城市相比，RRR地区和Low-SES的人们在农业和工程相关培训的入学率更高，在卫生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的培训与主要城市持平。虽然这些“边缘人”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可能获得较低水平的资格，提供教育与培训的机构普及度也相对较低，但是不同地区学生的学徒制或培训程度的总体差异并不大，主要城市学徒制项目入学率为13%，而“边缘人”学徒制项目入学率为16%，“边缘人”获得当地培训的比例更高。

同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者具有一系列灵活的培训提供模式，包括内部提供（如基于课堂的）、外部提供（如在线课程或通过其他通信工具提供）、基于工作场所的、或上述这些方式的组合，越来越多“边缘人”通过私立RTO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2020年，私立RTO占“边缘人”职业培训项目入学人数的50%，并且学生对培训的满意度普遍很高，2017—2021年一直保持在90%左右[24]。据高等教育改革的就业准备毕业生一揽子计划显示，到2021年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将创造多达30 000个新的大学名额和50 000个新的短期课程名额，并为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在4年内提供1 710万加元，使来自RRR地区的Low-SES和土著学生能够获得需求驱动的英联邦支持的

大学名额。2021年已有160名“边缘人”学生受益，预计2024年将增加到1 700多名学生[25]。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还提出了教育和就业技能（Skills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SEE）计划，帮助符合条件的求职者获得参与澳大利亚社会所需的技能，SEE计划为全国各州和地区的公民提供长达650小时的免费培训，包括原住民、青年、残疾人、老年人、“边缘人”，以及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求职者。在2019—2020年度的SEE计划后监测调查发现，3/4的参与者对SEE活动质量表示高度满意，该计划提高了他们找工作的机会和自信，有利于个人自身成长和社会稳定发展[26]。

五、个人发展：职业教育效能认同的根本因素

个人发展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始终关注的命题，个人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获取技能、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健全人格，这一系列作用和功能深刻影响个人对职业教育与培训效能的认同。不论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效率认同还是效益认同，归根到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以人的发展为根本动力，能否推动个人发展是判断职业教育效能认同高低的根本因素。

（一）重点关注培养利于个人发展的关键能力

个人关键能力是个体在教育、工作等不同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最基本、可迁移、跨职业、大范围适应的独特技能，是超越具体专业技能的职业能力。这是个人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习得的能成功适应未来职业生活所需要的广泛的迁移能力。它影响着个人适应社会、胜任工作以及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十分重视个人在此过程中关键能力的习得。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教育与技能的未来2030”项目。该项目对当今学生需要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作出总体性思考，并深刻表示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仍然至关重要，在数字转型时代，数字素养和数据素养逐渐成为重要技能；同时，个人保持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能力也不容忽视[27]。2022年，澳大利亚将177个工作岗位的技能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最终分为核心技能（也被称为“基础技能”或“就业能力技能”）、专业技能、技术工具技能三类技能，强调技能组合的价值，以提供侧重于雇主需求的培训，并支持为系统中的技能组合培训提供资金，为人的技能发展提供充分条件[28]。

澳大利亚职业发展蓝图以职业理论为基础，可以指导个人职业发展工作并支持整个生命期的职业发展学习框架。它确定了12项职业管理能力，并将其归入三个学习领域，即个人管理、学习和工作探索、职业建设。基于每个学习领域又进行阶段细分，即意识、探索、起步、基础工作和晋级五个阶段。蓝图强调个人发展良好的自我认知，支撑学习者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偏好并做出合理的职业发展选择[29]。无论是基础的读写算技能，还是随时代发展的数字素养、职业管理能力，关键能力的培养和习得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始终都处于重要的发展地位，只有牢牢把握好关键能力，才能使个人发展能快速适应社会外界的变化。

（二）实施满足个人多样化需求的教育培训计划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其灵活多样、内容丰富且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教育计划和培训项目为特色，从而打造自身国家的职教品牌，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以能力本位（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BE）为指导思想，以RTO为实施载体，结合国家统计局、TAFE研究中心、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学校等各方提供的信息，借助国家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n Quality Training Framework，AQTF）在行业培训包的基础上合作开展教育与培训，并根据本国社会大环境创新实施众多教育培训计划，如1984年的平等参与计划、1986年的成人培训计划、1987年的青年培训计划、1977年失业青年计划以及1998年的新学徒制等。不同计划在不同时期有着差异化的功能和指向，以最具特色的学徒制为例，如今澳大利亚新学徒制整合了传统学徒制和受训生制两种基本类型，成为行业覆盖面广、学习者可进入性

强和社会认可度高的一项重要培训计划。

澳大利亚学校本位的新学徒制（Australian School-based Apprenticeships，ASbAs）允许个人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进行职业培训、赚取工资并获得实践经验。培训由RTO提供，培训出勤要求、报酬标准等将取决于个人与受雇企业的协议。学徒同澳大利亚其他工人一样享有退休金、工人补偿和其他权利或要求。为有效实施新学徒制，澳大利亚提出与之配套实施的学徒支持网络（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Support Network，AASN），学徒支持网络帮助个人匹配雇主和注册培训机构来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会提供培训合同进行合理合法的工作实践。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结合了中学科目、有偿工作和在职岗位内外的职业培训，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实际的行业经验，并有能力在获得中学证书的同时，努力获得或完成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这是提升个人技能、推动个人发展的有力途径[30]。为促进新学徒制的有效实施，澳大利亚于2022年1月推出新的学徒激励计划（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 Incentives Program，AAIP），通过加大对残疾学徒的工资支持、招聘激励与优先工资补贴激励等措施的实施力度，让学徒从事有需求的稳定工作，填补现在和未来的技能短缺，形成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齐头并进的良性局面[31]。

（三）开设行业为主导、个人为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

为更好满足行业对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求和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课程的个性化需求，澳大利亚在提供职业教育内容方面特别重视促进学生个人与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挖掘学生职业潜能，提供职业指导和咨询服务等措施，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和社会认同，其中，以行业为主导、以个人为中心的培训包模式最为典型、最具特色。澳大利亚培训包具体规定了个人在工作场所有效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以能力单位表示，培训提供者为学习者设计定制化的培训课程，以支持学习者的个体诉求与雇主、行业的切实需求。培训包包含认可内容和支持材料，其中认可内容主要涉及能力标准、评估指南和职业资格等；支持材料则是学习策略、评估材料和职业发展材料。培训包作为实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载体，把行业从业能力要求与教育培训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为课程的开发和教学的规范性提供保障。在课程提供方面，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授课方式灵活多样，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在线教育、远程教育、学徒制培训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教育领域中每一位学习者都拥有独特的学生标识符（Unique Student Identifier，USI），它作为所有参加国家认可培训的学生个人编号，允许学生访问所有澳大利亚培训成就的在线记录，便于学生就业、转换学分。其使用不仅有利于雇主快速识别求职者所持的资格证书，有助于培训机构共享信息，也有益于政府了解职业技能的供需匹配度，构成强大的数据资源库，服务于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每一主体。此外，为实现职业教育课程内容标准化、课程实施灵活化、课程政策长效化、课程管理分权化等目标，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根据现实需求不断完善改进课程内容和资格框架。2022年3月，国家微证书框架发布，它满足了学习者对短期课程的需求，使劳动者能够在快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中快速提高技能或再技能，并帮助学习者追求就业或更高的资格，并为学生创建一个用户友好、全国一致的网站平台——Micro-cred Seeker。微证书试点与多个行业合作，在建设中投入200万美元用于设计微证书，1 650万美元用于提供微证书，多达4 000名学生从中受益，在学习者群体中获得高度的效能认同[32]。

六、结论与展望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创新发展计划和实施特色项目，充分展现出职业教育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前提条件，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要保障，以推动个人发展为根本因素的巨大效能，为职业教育获得高度的社会认同奠定基础。澳大

利亚职业教育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个人发展四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成效是其职业教育获得效能认同，进而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在通过提升职业教育效能认同进而提升职业社会认同的路径中提供了独特的“澳洲方案”，也为我国缓解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危机指明了方向。

一是从职业教育提高生产效率视角出发，重视挖掘职业教育的综合价值，将学校教育生产效率、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国家政策生产效率等多个层面的价值统筹起来，构建起目标导向的职业教育发展支持体系。不仅要成立任务细化、责任共担的各专业工作委员会，全权负责部分创新项目的启动、实施、调整和反馈等，还要学校（实施）、社会（应用）、国家（保障）三个方面统一支持职业教育，促进先进技术的转化应用、技术操作人员的培训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更要不断加大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完善法规政策体系。

二是从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视角出发，重视行业、工会参与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布局，致力于精准服务当地产业经济发展，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同国内经济市场发展需求同频共振，在此基础上适时进行有效国际经验传播，推出本国职教品牌，扩大世界范围内国家教育推动经济的影响力。

三是从职业教育维护社会稳定视角出发，着力构建特殊人群集数据收集、就业培训、课程学习于一体的服务网站，完善“社会保障网”建设工程，完善对社会特殊人群特殊需求的及时化、规范化及个性化的服务，挖掘其能力、保障其权利。

四是从职业教育推动个人发展视角出发，力争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点一致，通过系统规范的长效合作机制促进各方朝共同目标努力。

参考文献：

[1]BILLETT S. The stand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ources of its societal esteem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enact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2014,66(1): 1-21.

[2]石伟平.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J].江苏教育，2010，739(15)：16-20.

[3]李名梁.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度的关键要素研究[J].江苏高职教育，2022，22(1)：23-30.

[4]VET in Schools 2021[EB/OL].(2022-07-20)[2023-04-04].https://www.ncver.edu.au/research- and- statistics/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vet-in-schools-2021.

[5]Total VET students and courses 2021[EB/OL].(2022-08-18)[2023-04-04].https://www.ncver.edu.au/research-and-statistics/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total-vet-students-and-courses-2021.

[6]VET student outcomes 2022[EB/OL].(2022-12-15)[2023-04-04].https://www.ncver.edu.au/research-and-statistics/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vet-student-outcomes-2022.

[7]Employers´ use and views of the VET system 2021[EB/OL].(2021-10-28)[2023-04-04].https://www.ncver.edu.au/research-and-statistics/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employers-use-and-views-of-the-vet-system-2021.

[8]董仁忠，杨丽波.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演变——基于政策的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2)：108-116.

[9]TAFE in Australia: report on needs in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April 1974 [Kangan report] [EB/OL].[2023- 05- 27].https://www.voced.edu.au/content/ngv%3A38436.

[10]罗舒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90—2017)[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416.

[11]Australian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2030 [EB/OL].(2021- 12- 07) [2023- 04- 04].https://www.education.gov.au/australia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21- 2030/resources/australian-strategy-international-education-2021-2030.

[12]Employment Outlook to November 2026[EB/OL].[2023-04-04].https://labourmarketinsights.gov.au/our-research/employment-projections/.

[13]2022 Skills Priority List Key Findings Report[EB/OL].(2022-10-06)[2023-04-04].https://www.nationalskillscommission.gov.au/reports/2022-skills-priority-list-key-findings-report.

[14]JSA submission to the Inquiry into the Perceptions and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EB/OL].(2023-03-31)[2023-04- 04].https://www.jobsandskills.gov.au/news/submission- inquiry-perceptions-and-status-vet.

[15]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n aid: promoting prosperity, reducing poverty, enhancing stability[R]. Canberra: DFAT, 2014: 1.

[16]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aid investments in education 2015- 2020[R].Canberra: DFAT, 2015: 5.

[17]袁李兰，吴雪萍.澳大利亚对外职业教育援助：动因、路径与特征[J].比较教育研究，2022，44(3)：95-103.

[18]BUYS N, MATTHEWS L R, RANDALL C. Contemporary vo-

cational rehabilitation in Australia[J].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2015, 37(9): 820-824.

[19]e-Learning[EB/OL]. [2023-04-11]. https://disabilityawareness.com.au/elearning/.

[20]Overview of the TSEP model in application for prospective Specialist Employment Services partner organisations[EB/OL].[2023-04-04].https://www.adcet.edu.au/resources/usep-and-tsep/tsep-toolkit/why-tsep.

[21]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monwealth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Employment Strategy[R].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15:2.

[22]陈琪,李延平.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反土著人贫困研究:需求驱动的VTEC模式[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9):116-128.

[23]Job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for people in remote Australia[EB/OL].(2012-04-26)[2023-06-01].https://ministers.dese.gov.au/macklin/jobs-and-sustainable-communities-people-remote-australia.

[24]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regional, rural and remote Australia[EB/OL].(2023-01-25)[2023-04-04].https://www.jobsandskills.gov.au/reports/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regional-rural-and-remote-australia.

[25]Job-ready Graduates Package[EB/OL].(2020-06-19)[2023-04-08].https://www.education.gov.au/job-ready.

[26]Explainer: Skills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rogram[EB/OL].(2021-04-06)[2023-04-04].https://www.dewr.gov.au/newsroom/articles/explainer-skills-education-and-employment-program.

[27]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Education 2030[EB/OL].[2023-05-30].https://www.voced.edu.au/content/ngv:79286.

[28]Australian Skills Classification[EB/OL].[2023-06-06].https://www.nationalskillscommission.gov.au/australian-skills-classification.

[29]Australian Blueprint for Career Development[EB/OL].[2023-04-04].https://www.yourcareer.gov.au/resources/australian-blueprint-for-career-development.

[30]Australian School-based Apprenticeships[EB/OL].[2023-06-06].https://www.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gov.au/school-based-apprenticeships.

[31]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 Incentives Program Guidelines [EB/OL].(2022-07-01)[2023-06-06].https://www.dewr.gov.au/skills-support-individuals/resources/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incentives-program-guidelines.

[32]National Microcredentials Framework[EB/OL].(2022-03-22)[2023-04-08]. https://www.education.gov.au/national-microcredentials-framework.

（上接第84页）

[7]周蒋浒.新时代职业教育校企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与实施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1(17):40-44.

[8]王佩,王国华.新时代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机制研究[J].职教论坛,2021,37(9):154-159.

[9]邹吉权.基于1+X证书的“四方联动、五链耦合”人才培养机制研究[J].成人教育,2021,41(4):46-52.

[10]韩永强,王仙芝,南海.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度测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1):47-52.

[11]王佳盛,立强.我国高技能人才供需结构的产业差异性及协调性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1(11):35-41.

[12]周文斌,李宁.能力倾向下“中高本”协同发展的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研究[J].企业经济,2022,4(3):141-151.

[13]张志新,原博,赵浩宇.京津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内容分析及协同策略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72-83.

[14]古翠凤,张雅静.类型教育视角下中高职人才贯通培养的协同机制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25):24-30.

[16][24][32]郭广军.长株潭职业教育一体化高地的推进策略研究[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8(4):95-97.

[17][25][29][30]刘阳.区域城市群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建设的思考——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20,29(6):3-10.

[18]马俊红.浅议京津冀智能制造业技术技能人才共育机制的构建[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21,23(12):32-36.

[19]苏江.东莞制造业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1(7):100-103.

[20]曹国平.粤港澳大湾区高技能与工程技术人才贯通研究——基于广东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16):167-174.

[21]敬永春,杨婷,唐春勇.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政策供需适配偏差及矫正:以四川省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0,37(1):127-142.

[22][26][28]宋杰.株洲市制造业人才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及生态位策略[J].科技和产业,2023,23(7):117-122.

[23]田楠.京津冀产业转移中技术技能人才社会生态环境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3):77-88.

[27]郭红洁,谭辉.长株潭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评价[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2):43-51.

[31]李定珍,侯杰.对接“三高四新”的湖南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模式与路径[J].职教通讯,2023(1):22-28.

[33]刘蓉,宋杰.株洲制造业人才发展状况、路径及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2023,22(4):8-14.

[34]宋杰.长株潭技能人才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及生态位策略[J].机械职业教育,2023(4):8-12.

[35]汪怿.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格局、变局、布局[J].南京社会科学,2021(12):1-11+20.